



KUANGGE
DANGKU

记石鲁

当狂
哭歌

李世南\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当狂 哭歌

KUANGGE
DANGKU

记石鲁



李世南\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歌当哭：记石鲁 / 李世南著. — 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368-3180-3

I. ①狂… II. ①李…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5588号

责任编辑 张化梅 唐美娜

封面设计 哲 峰

责任校对 党红雨

狂歌当哭——记石鲁

李世南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人：李晓明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本 15.5印张 24插页 200千字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7-5368-3180-3

定价：48.00元

地址：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http://www.msbs.cn>

发行电话：029-87262491

传真：029-87265112

版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作者简介

李世南，浙江绍兴人，1940年生于上海。1962年师从何海霞先生，1971年师从石鲁先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家画院特聘研究员，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他是当代大写意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他承继梁楷、徐渭、石鲁一脉，丰富发展了泼墨、泼彩的大写意人物画。开拓了人物、山水、花卉的打散与融合。在半个世纪里，他以坚定的艺术跋涉，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李世南还出版有回忆录《狂歌当哭——记石鲁》以及《羁旅——病中日记选》《笔墨·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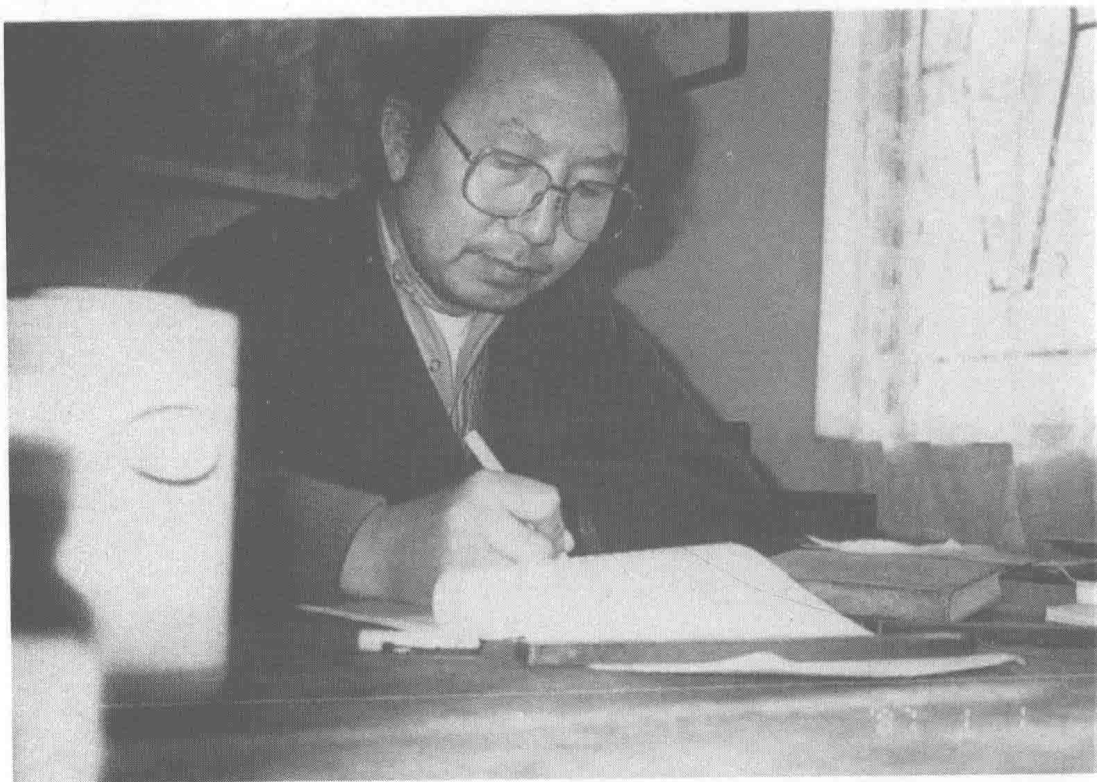
对其艺术人生的研究专著有刘子健的《李世南的水墨世界》、王纯信的《笔情墨缘》、冯毅的《岁月有情》、李萌的《中国名画家全集·当代卷 / 李世南》。



李世南与老师石鲁 1976 年毛主席逝世期间，摄于西安石鲁好友郭琦家中。



叶坚 摄



1994 年李世南于深圳寓所养病中撰写回忆录《狂歌当哭——记石鲁》

石鲁疯了

~~第一次见石鲁~~

连阴了几天，终于下起今年的第一场大雪。

西安城在风雪的裹挟中披上了银装，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钟鼓楼，色彩斑斓地耸立在一派白茫茫、灰蒙蒙的瓦屋之上，迥然而肃穆。

西安市美术馆协会大院里几十间错落参差的土瓦房就拥挤在钟鼓楼下的西北角，几乎被大雪压扁似的，与数百年前的建筑相比，显得苍老破败。

这是一九六五年冬天。

那时，我在西安高压电瓷厂当锻工，才二十五岁。业余跟何海霞先生学习国画，同时也为报纸画漫画，是西安金箍棒漫画学会的骨干。

《狂歌当哭》序

鲁光

人的一生总会有许多遗憾。我的一大憾事是1982年初去西安时，失去了拜望大画家石鲁的一次机会。

那次接待我的是陕西国画院院长方济众先生。我们聊天作画，真有相见恨晚之感。临别时，方济众很遗憾地说：“本来打算陪你去看望石鲁的，但这两天他病情太重，只好待以后有机会再去看他了。”不料，半年之后就传来石鲁病逝的噩耗，我永远失去了拜见这位“长安画派”首领人物的机会了。

石鲁的画，我读过不少。起先是壮丽雄奇的北方高原和气宇轩昂的领袖风采。往后，就是冷峻犀利的花卉和斧砍刀刻的山水和书法。据说，画风的骤变皆缘于十年“文革”。还听说过，石鲁被逼疯过，而且疯后的画更奇更怪也更有味。在我的印象中，石鲁其人其画无不是个谜。

想不到，时隔十多年之后，我的好友李世南用一部书稿《狂歌当哭——记石鲁》，不仅消除了在我心里郁结了十多年的那件憾事，而且使我认识了石鲁的真实面貌。

记得是1994年4月间，我随大陆图书展览代表团赴台北。途经深圳时，我挤时间夜访世南，聊至午夜，在他家下榻了一宿。其时，世南刚经历了一次死亡的威胁，才从“九死一生”中缓过气来，行动还极不方便。画得极少，我只见过挂在他画案对面墙

上的一幅小品，画的是观音菩萨。

世南说：“人们都说我过去尽画苦的人物，所以遭此厄运。大病初愈，我就画了这幅慈祥的观音，但愿命运会好起来。”

我知道，其实他是累得病倒的，因为做人、做事、作画都太认真。

世南拿出一叠稿子，很谦逊地说：“没有画画，我写东西了，写我的老师石鲁。已经写了几章，不知道行不行？写东西太难了。”

我急忙翻阅他的手稿，写得很实在，很有情感，而且特有价值。因为那天未戴眼镜去，看了两三章眼前就模糊起来。我放下稿子，对世南说：“写下去吧，很有价值的，而且文笔也挺好的。”停了停，我又提了点建议，“不过，还可以再写得放开一些，尽你所见所闻都写出来，愈具体愈生动愈好。”

世南说：“我得慢慢写，再用一年时间把它写完。”

1996年5月初，世南来电话：“石鲁的书稿写出来了，先寄给你过过目。”

十多万字，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一读就停不下来，想往下读，太吸引人了。卒读之后，回味无穷，思索无穷。我是那么激奋，立即打电话给世南，“稿子读完了，你写了一部好书，把石鲁这个人物真正写出来了。而且，把石鲁的艺术见解也生动地写出来了。”

我知道，世南崇敬石鲁，一直追随他，如今又在石鲁未竟的艺术之路上进行苦苦探索前行。他是用他的全部情感，不，应该说是用他的生命去写这本书的。我几乎逢人就推荐这本尚未问世的著作。见了旅美画家徐希，见了画界朋友刘勃舒、石虎、张立

辰、张广……我都兴奋地向他们推荐：“李世南写了一本关于石鲁的好书。”

那是一个深夜。卒读之后，我坐在我那间书房兼画室的五峰斋的灯下，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些文字：

一、感谢世南兄写出了真实的石鲁。虽然，世南只写了他与石鲁的一次次相见相聚的所见所闻，其实是写了石鲁生命的最后十年，充满坎坷、不公和悲愤的十年，也是石鲁人生最璀璨的十年。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视艺术为生命的大艺术家；一个直面人生、与命运抗争不息的大艺术家跃然纸上，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真实实的石鲁。读过不少写画坛人物的书稿，见事不见人者居多。世南用那支老辣的笔写人而见人，实乃不易也。

二、这是一部生动的石鲁画语录，真知灼见比比皆是。与世南谈论“什么叫传统”时，石鲁说：“传统就是一代一代创造出来的，传到今天就叫传统。你如果创造得好，传下去就是传统。”精辟之极！石鲁的艺术见解，都是在看画论画中即兴而说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令人叹服。

三、由于世南是石鲁的弟子，所写的均是亲身所见所闻，是第一手材料，读起来就格外亲切可信，不仅有文学价值，而且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四、因为世南是一位擅长人物画的丹青高手，善于观察人，刻画人，文字表达又别具一格，对石鲁的形神描述都有独到之处。可以说，形似神更似。几处对石鲁的描述，都不同凡响。如描述石鲁的八字胡“像一对犟牛的犄角”，真是入木三分地刻画出石鲁倔强的个性。又如写石鲁弹琴唱歌，从“王老三”唱到“风在吼，马在叫”……狂歌当哭，痛快淋漓地揭示出石鲁内心

深沉的悲愤。世南“客串”写作，与作家“客串”画画一样，往往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

此书具有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我想与世南兄本身的经历是不无关系的。像他这种“九死一生”者或者有过“死”的体验者，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要比常人深刻，对人生的悟性要比常人高深，对艺术的理解要比常人超凡脱俗。不是此时的李世南，是绝写不出此书的。

我的这些读后随记，很零散，算不上对世南大作的评论。真真的评论，是评论家们的任务。但我相信，《狂歌当哭》必将为画界所钟爱，为广大读者所争相阅读。开卷有益，卒读则获大益，对此书而言，将是无疑的。

1996年6月12日于五峰斋灯下

序 二

聂雄前

和世南先生相交已经四年了。从表面看，他是一位不与世事的都市隐士，尽管没有条件“采菊东篱下”，但“悠然见南山”的神色总在眉宇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正如陶渊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时候一样，李世南的艺术世界并非一派静穆，有些作品中近乎狂野的生命张力，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去年，在他本该静养以康复病体的时候，他却满怀伤感、悲愤地开始撰写关于他的恩师石鲁的回忆录，真正出人意料。

李世南在本该静养的时候，为什么“狂歌当哭”？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我注意到，在李世南从事艺术创作的30多年岁月中，深圳似乎成了一道分水岭。即使在“文革”时期，由于有何海霞、石鲁等大师的指点，由于他工人身份的硬壳，他的人生和艺术也呈上升态势；进入新时期，得石鲁“当头棒喝”已经从“三突出”“主题先行”沼泽中抽脚的李世南，艺术思维在拨乱反正的洪流中抢占潮头，马上头角崭露，成为“长安画派”中声名鹊起的后起之秀；到1984年，艺术家特有的敏感使他从西安南迁武汉，赶上“文化寻根”思潮的早班车，以《开采光明的人》《长安的思念》《南京大屠杀48周年祭》和《巫山梦》等大量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画界卓然独立的创作地位。李世南在20世纪80年代，无疑将自己的人生推到了丰盈与绚丽的境界，画作像鸟

儿一样飞向各家美术杂志，画册像秋叶托不住的金苹果纷纷坠地，画评也像喜鹊隔三岔五来他家门前报喜。

但是，这一切在来深圳之后似乎远去了，犹如隔夜的梦境。在这个经济如春草般蓬勃疯长的城市里，挤在急欲脱贫致富的人群中，一心一意要在这里接受现代文明洗礼、建立崭新艺术语言的李世南，马上感到自己是异类。日积月累长期养成的艺术人格，不可能转换成市场人格，在深圳，他找不到自己如鱼得水的圈子，而在内地的圈子里，由于他走入的是一个“文化沙漠”，由于对他的艺术前途不能肯定，也因他的缺席将他悬置了，这样，他处在意义的真空之中。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是一棵长满需要的树。李世南像常人一样需要关注，需要对自己艺术新探索的肯定或否定，但是，这些他以前视为平常的东西在一个晚上之后就消失了，他当然会感到茫然和惊恐。移居深圳的前两年，李世南始则有强烈地渴求对话的焦虑，继之沉入灵魂的独白（在画作上表现为对渺小若蝼蚁般的生命的伤感，匆匆如过客般的人生的喟叹）。近乎必然的，他病了，而且正是那种不通则痛的脑血栓。

以我浅陋的学识，窃以为是这场病拯救了世南先生的艺术生命。如果将他的写意人物画在灵魂独白的道路上发展下去，就不可避免地会陷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对“道”的绝对精神和“静”的绝对圆满的痴迷追求之中，人间烟火味的淡化必然带来“只堪自怡悦”的艺术命运。——写意的抽象和独白的自足，会付出丧失社会影响功能和社会遗传功能的代价。他病了，而且到达“垂死”的状态，使他有可能深刻地反省自己的一生，在脑海中过滤人生最有价值的细节和瞬间，对自己的人生状态和创作状

态进行一种自觉地调整。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李世南在不应该的时候“狂歌当哭忆石鲁”才可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石鲁，是李世南走上艺术道路的引路人，是他心中的太阳。对石鲁的回忆是他对自己在苦难中成长的岁月的回忆，对石鲁的再次打量是他对自己艺术道路的再次打量，对石鲁人生和艺术坎坷遭际的哀怜，又何尝没有带上对自己的一份哀怜呢？要达到如书名所标示的“狂歌当哭”的境界，李世南不可能不融入自己的生命血肉！

作为有幸最早读到这部书稿的人，我不出意料地看到，李世南在记忆的河流中淘洗出了无数的金子。只要对照一下石鲁没有写完的《学画录》，我们就会发现“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绿”这句名言的正确性。由于面对的是学生的习作，石鲁脱去了写《学画录》时穿的文言文外衣，不再考虑归纳、综合，往往在有的放矢基础上兴之所至，谈画人物，谈素描，谈临摹传统，谈创新，谈生活，到处都有灵光闪现，都能发人之未发，想人之未想。正因为石鲁当时所处的悲惨境地，他对他面前的这个学生李世南的授业，就毫无疑问地带有一种辩白和证明的性质：既然举世滔滔皆曰可杀，那么我要表白我的价值所在；既然众人都以“野、怪、乱、黑”的石鲁风格为丑恶，那么我要证明它美在何处、美从何处来。因此，在李世南这本回忆录里所展示的石鲁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他关于艺术的精辟见解，都有学识和经验的双重支撑。在本书占有较重分量的石鲁谈艺术的章节，既然经过李世南在以后20年专业创作实践的验证，还被认定具有极高价值，那么，本书所提供的石鲁艺术观点和创作经验，无疑是研究石鲁的宝贵资料，也是后来者从事艺术创作的重要借鉴。

总结石鲁的艺术创作经验，检视自己生命成长岁月中记忆汰选出来的金子，无疑是李世南写作的目的之一。然而，在深圳经历过从渴求对话到走向独白的阶段以后，在有过“垂死”的生命体验以后，李世南对石鲁的回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即为自己孤独的探索寻求精神上的支持，为自己寂寞的生活寻找灵魂的依托。这或许是潜意识的，但在《石鲁疯了》《困》《命》《文人悲哀》《滴血印章》《石鲁的学生》等章节里，我分明看到了艺术以外的关于人生反思的内容。从李世南的回忆看，石鲁实在是一个正常、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人，他的不见容于世纯粹是因为他对艺术个性的执着追求，对真善美的死命坚持，这是一种由性格决定的命运悲剧。

石鲁悲剧的深刻性，在我看来是他陷入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对于他这样一个天才艺术家建立在学识和经验基础上的艺术创新，不去看他在写意性发挥中的客观生活的依据和清醒的理性制约，而一味施以“野、怪、乱、黑”的政治大棒，使得艺术家没有艺术上的知音或对手，不能辩驳也无从辩驳，只能装疯卖傻、佯狂于市。严家炎教授早几年曾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最大的误区是“异元批评”——对现实主义文学用浪漫主义的标准，对浪漫主义文学用现代主义的标准，造成批评与创作的疏离。其实，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的最大误区恐怕是对文艺以政治标准来评判，在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已成定评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功利、实用的政治标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剥夺了艺术家个性的发挥和创造的自由。主体生命意识强悍如石鲁，也不得不佯狂于市，不得不靠讲“困”的谜语自我解嘲，身陷“无物之阵”中的巨大孤独和忧愤深广是可以想见的了。

李世南没有深究造成石鲁悲剧的原因，他只凭自己作为画家独具的形象记忆能力，去刻画石鲁身陷“无物之阵”的茫然、忧愤、孤独，他只为我们提供一个个鲜活的细节让我们自己去感受“无物之阵”的恐怖，但我们看到了文化传统的沉重，看到了左倾政治的凶恶。作为一个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从事文艺宣传的艺术家，在政治风暴尚未降临时，他的每一次展出都可以成为艺术界的节日，每一件作品的发表都可以引起人们的欢腾，为什么在政治风暴降临之后，他的所有价值就消失殆尽了呢？确实，石鲁的创作在“文革”时期走到了“离经叛道”的顶点，但是难道一个具有丰厚学养和创作经验的艺术家的“离经叛道”能够空穴来风吗？难道没有艺术发展的内部规律在驱动和生发？这些近乎常识的东西，在盲目的政治批判中都顾不上了。政治在打政治的拳，石鲁这个艺术的靶子看上去体无完肤，实则一无触及。这是一种怎样的“黑色幽默”啊！

李世南在深圳的遭际是不是也有身陷“无物之阵”的味道呢？石鲁在“无物之阵”中的突击与坚守是不是给了李世南一种启迪呢？应该是这样的。时代不同了，强加在艺术上面的政治干预已经摒除了，但先锋的孤独一如既往。我想，艺术家在向艺术的腹地深入之后，更多的是一种冷暖自知的境界。从石鲁身上，李世南应该悟到这一点；从自己的深圳经历中，李世南应该有这种切身体会。

似乎可以说，狂歌当哭的李世南，在祭奠石鲁的过程中，也完成了一次死生悟道，一次人格修炼，一次坚持艺术个性的立誓。我清楚地知道，屹立在世纪末的风中，无数20世纪的送行人，都以自己的形式在进行世纪回眸。空旷废墟、萋萋芳草、夕